

##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承与高校思政工作,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红色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与数字技术快速普及,网络游戏已从娱乐形态转变为重要文化传播载体,为思政教育创新提供新可能。黄铭心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必然,也是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的关键路径。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依托橙光游戏平台开发红色教育交互游戏《星火燎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推动思政教育模式革新。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与实证分析,系统评估游戏在民办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星火燎原》能够有效提升民办高校学生红色文化知识储备,强化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为破解传统思政教育困境提供新方案。

## 二、当前民办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现状与困境

郑喆等学者认为当前民办高校思政课程仍以传统课堂讲授为主,教学方式高度依赖教师板书、PPT展示与理论灌输,学生多处于被动接收状态,形成典型“填鸭式”教学格局。课堂互动环节缺失,参与渠道有限,难以激发学生参与兴趣与自主探究意识。民办高校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沉浸式与互动性体验,传统单向教学模式与学生认知习惯、学习需求错位,导致课堂注意力分散、参与度偏低、学习氛围薄弱,最终影响思政教育整体效果。

# 病人主体性的化约与复归

■ 李元来

## 一、引言

耐药结核病患者 YSY 感叹:“跟大夫说完症状,他就给你开各种检查单子,等结果出来,有问题再拿药,整个过程三五分钟,剩下的时间就是排队缴费和排队检查。”病友“河南老王”应和:“对,要看各种指标说话的,医生要根据数据分析!”可见,在生物医学模式下,病人的生活世界与数据症状被日益专业化的医学系统和客观指标遮蔽。朱森认为,从床边医学到医院医学和实验室医学,医学宇宙观由全人导向演化或客体导向,治疗的中心也从“人”转移到“病”上,“全人”病人的样貌变得模糊乃至消失。

**二、病人主体性的化约表现**  
病人消失的本质是作为“全人”病人的主体性被化约。在接受现代医学的标准化治疗时,病人的身心被分割、生活世界被抽离,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能动生命主体,而是被简化为一具病体,变成仪器分析与检验报告上的客体。记载着症状体征与医疗处方信息的病历,无关乎病人个体性格与疼痛体验,不在意病人生存状况、生活习惯与生命故事。

病人主体性的化约表现如下:其一,病人的身体经验和感知能力被否定,身体成为现代医学视野下被研究和治疗的客体,且被对象化为生物性身体、主体性化约后的身体不再是一种具身性身体,而呈现为一种介质身体,即借助现代医学技术采集到的各种数据和影像构成的数据态身体,身体机能实现生化指标化,身体构造实现影像化。其二,超越时空的标准化医学诊治模式以去情境化方式,隔离作为社会文化体系成员之病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有故事有态度的鲜活生命被化约,成为“病理—解剖—影像”框架下一个功能失调、指标异常的物理和生物对象。不仅如此,为了消除偏差行为以维系社会体系的稳定性与凝聚力,病人还必须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而迅速恢复健康,结果沦为病人角色的傀儡。

**三、病人主体性的化约后果**  
一方面,病人被抽象化。医生为了认识病理事实真相必须对病人进行抽象,医学解读必须把病人放入括号里进行考量,忽视致使病人痛苦的根源。如福柯所言,病人被视为一个外在事实,具体的肉体、可见的整体以及丰满的实在物,变成自然体的间断、空隙和距离下的负面症候。满装着人体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病理生理学、诊断学、药理学等医学知识的现代医生,不能也不会持续关注“全人”病人,不知也不顾病人的治疗感受和患病体验,将活生生的病人抽象化为被动接受各种科学仪器检测与治疗的物体。

另一方面,病人身体被零碎化。越来越专科化的医疗体系将全人的整体身体拆解成零散的部分,机械化的

# 红色教育交互游戏驱动系统

——以《星火燎原》为例

■ 姜芳 申语涵 哈彤 王思家 徐旺成

实践能力,为思政教育方式创新提供新路径。

其次,《星火燎原》不仅服务学生学习,也为教师教学改革提供数字化工具支撑。教师可依托游戏后台数据,全面追踪学习任务完成进度、历史节点选择偏好、知识薄弱环节与行为倾向,精准诊断学习痛点与教学盲区。基于数据证据动态调整教学内容、进度与方法,实现个性化指导与精准化育人,打破传统教学“一刀切”局限,推动思政教育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从整体讲授走向因材施教。

此外,游戏以交互叙事、情境体验与情感浸润为核心,将多元思政理论、红色历史事件与革命精神谱系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感悟的内容体系,丰富教育资源与教学形态。“游戏化+思政教育”模式突破时空限制,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生活,贴合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习惯,满足个性化、多样化、趣味化学习需求,推动红色文化入脑入心,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新时代青年。

## 四、红色教育交互游戏设计逻辑与运行机制

游戏历史场景遴选严格遵循历史代表性、教育功能性、技术可行性三大核心原则,确保教育性、真实性与体验性高度统一。历史代表性原则优先选取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精神象征意义与标志性事件的关键场景。以井冈山为例,作为中国革命摇篮与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集中承载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战略智慧与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能够直观呈现党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抉择,帮助学生理解“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实际逻辑,让抽象精神转化为可体验的历史情境。

教育功能性原则场景选择以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为目标,突出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以延安为例,作为抗战时期革命指挥中枢与精神熔炉,是党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孕育了伟大延安精神。场景可整合大生产运动、文艺座谈会、党的七大等多元内容,让学生在统一空间内系统体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等红色内涵,实现多维度、系统化价值浸润。

技术可行性原则场景需具备数字还原与沉浸呈现的可行性,井冈山竹林茅屋、延安窑洞等标志性视觉符号易于构建高真实感历史空间,提升代入感。开发资源应集中投入历史氛围渲染、交互逻辑优化与教育价值落地,避免无效资源消耗,在保证历史真实性前提下提升流畅度与感染力,实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目标。

为保障学习持续性 with 效果可视化,实现精准育人、个性化育人,研究构建反馈激励系统。聚焦核心思政知识点,确保全员掌握关键内容,如完成三湾改编剧情、理解“支部建在连上”制度优势。此外,提供深度探究空间,如收集解读苏区土地改革文件,完成分析报告,满足高阶学习需求,提升思辨与研究能力。同时,在系统后

# 社交媒体语境下中小学生学习网络流行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与规范引导

■ 区茵华

## 一、引言

在当代社会语言学与传播研究中,话语分析始终是剖析语言、权力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重要方法。本研究旨在贯通微观文本分析与宏观社会阐释,揭示中小学生学习网络流行语背后的实践逻辑。这不仅是对现代汉语语法规则在数字时代的有益补充,更为教育工作者科学疏导校园话语矛盾、引导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网络话语表达习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学理支撑与干预路径。

## 二、校园网络流行语的微观语法与文本特征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 2024~2026 年期间国内主流社交平台 B 站、抖音的高频互动文本,以及部分中小学校园实地访谈记录与随笔、周记等学生日常生活作业样本。基于该动态语料库的微观分析,发现校园网络流行语在词汇、句法及语义层级均呈现出突破常规现代汉语规范的显著变异特征:

(一)词汇层级的超常规重构与模因化生产

在追求语言表达经济性原则的驱动下,中小学生学习网络交际的词汇生成呈现出高度的混杂性、创新性 with 模因能产性。1.非标准缩略与语素重组

传统现代汉语构词多采用派生和合成方式,而网络流行语常采用跨越语法限制的缩略构词法。学者陈静指出,如“不明觉厉”(不明白,但觉得很厉害)这类缩略语,其构词格式表现为“语素+语素+音节+语素”,既打破了单纯词的构词规则,也颠覆了合成词的内在线索,导致语法结构关系弱化。

2.借音赋形与附加义衍生

学者刁晏斌在考察当代汉语造词方式时提出了“借音赋形”机制。

例(1):将“闺蜜”讹变为“闺蜜”(中小学生学习常用)。

通过借用“蜜”的同音字“蜜”,在保留原指功能的同时,内在植入了“甜蜜”“美好”的附加情感义素,体现了极致的语言内部修辞创造力。

3.高能产性类词缀与模因框架

现代汉语中的部分词根语素在网络语境中发生意义虚化,向具有高附加功能的“类词缀”转化。

例(2):“XX 精”(戏精、杠精)。

学者张华瑞进一步指出,当前青年与学生群体更倾向于使用结构稳定的“模因化”词语框架进行批量生产。

以上示例均采用高能产句式,填补了词汇空白,极大拓宽了语用适配范围。

(二)句法层面的成分消解与词类变异

相较于书面语的严整规范,校园网络流行语在句法建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松散化以及跨界限的重构特征。

1.句法成分的极简化消解与语序倒置

为追求社交互动中的高效与情感冲击力,句法成分的省略乃至消解成为常态。

例(3):“退!退!退!”

省略了主语与具体场景信息,仅保留核心动词以强化调侃或驱赶的意味。

例(4):“你还怪好的(嘞)”。

打破了传统语序规则,通过后置倒装策略凸显核心评价,实现了情感表达的极致化。

2.词类活用与句法功能越界

词类的跨界活用在中小学生学习网络话语中尤为普遍,名词常突破常规充当谓语。

例(5):“他又在凡尔赛了”。

这种表达将表建筑的名词“凡尔赛”转化为表示“夸张炫耀”的动词。

例(6):“我 emo 了”。

原本用于形容人情绪低落的形容词“emo”直接活用作动词,用以描绘个体内心情绪低谷的动态过程。

3.紧缩句的语序压缩

陈静强调,紧缩句作为特殊的复句形式被频繁借用。

例(7):“一言不合就 XX”。

将复杂的条件假设关系高度浓缩于简单的词语框架内,既增加了句子的节奏感,又适应了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

交中“短平快”的交际偏好。

(三)语义层面的“双轨并行”与隐喻生成

除了形式结构的变异,校园网络流行语在语义系统上也发生了深刻的演进。

1.隐喻与转喻机制的高度依赖

流行语的语义生成高度依赖以事物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如“电子榨菜”“雪糕刺客”等词汇,以及以邻近性关系为基础的转喻,如“小镇做题家”。这种修辞手法已内化为青少年群体共享的思维方式。

2.关涉性与描述性的复合

当代网络流行语兼具“关涉性”与“描述性”的双重功能,不仅指向客观社会现象或群体身份,还侧面反映主观情绪与自我评价。例如,“特种兵式旅游”既指代一种高强度的行为模式,又隐含了对青年群体时间与消费观念的戏谑评价。这种语义的叠加,使得流行语在极度凝练的形式中,承载了中小学生学习复杂的现实感知与心理诉求。

三、话语实践与社会现实:身份建构与圈层认同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中,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实践”来中介,并最终参与“社会实践”。中小学生学习网络流行语,正是透视该群体社会心理与微观权力结构的重要切入点。

(一)话语实践向度: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机制

话语实践关注的是语言使用者如何处理文本。在数字媒介时代,中小学习已不再是网络流行语的被动接收者,而是高度活跃的“产消者”,在校园语境中完成了一套独特的叙事闭环。

1.话语生产的“在地化”重构

中小学生在引进网络热词时,往往基于特定的校园生活经验进行“在地化”的意义协商与创新生产。例如,宏观社会语境中的“内卷”一词被引入校园后,衍生出了具有极强针对性的名词“卷王”和动词“开卷”。学生通过对这些词汇的拼贴与重构,将宏大的社会情绪精准转化为对学业竞争压力的微观描述。

2.话语分配的跨媒介流转

校园网络流行语的分配呈现出线上线下载交互的双栖特征。它们起源于 B 站、抖音等公共社交平台,随后进入 QQ 空间、微信群等半公开的学生私域圈层,最终以口语戏谑、传纸条甚至刻意写人非正式作文等形式,跨媒介流转至线下的物理校园空间。这种高密度的全景式分配,极大地加速了话语的模因化感染。

3.话语消费的“解码壁垒”

在消费环节,由于网络流行语高度依赖特定的语境预设,其意义的提取需要共享的“百科知识”。当学生在对话中频繁使用“尊嘟假嘟”(真的假的)、“City not City”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加密沟通。由于教师和家长往往缺乏相应的数字亚文化背景,无法有效完成话语的“解码”,这种消解过程客观上加剧了代际间的“话语壁垒”。

(二)社会实践向度:圈层区隔、身份建构与隐性抵抗

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结构,更积极地参与建构社会身份与权力关系。在校园这一微观社会场域中,网络流行语成为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社会实践的隐蔽而有力的工具。

1.符号互动与亚文化圈层的隐性区隔

在校园人际网络中,特定的网络流行语充当了“社交密码”与“区隔符号”。

例如,沉浸于二次元亚文化的学生会使用“扩列”(加好友)、“语 C”(语言 Cosplay)等专属词汇;而热衷于电竞圈层的学生则频繁交流“上分”“破防”“送人头”等术语。通过展示对某类特定亚文化符号的熟练掌握,迅速识别同类,划定趣缘边界。这种基于语言实践的身份建构,在内部形成了极强的群体凝聚力,而在外部则构筑起排他性的社交壁垒。

2.评价话语中的微观权力博弈:以“优等生”与“后进生”为例

网络流行语还深刻参与了校园内部分评价体系与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重塑。例

如,部分处于学业竞争边缘的“后进生”或中等生,常以“学渣”“鼠鼠我啊”“摆烂”(指任由事情恶化不再努力)等词汇进行自我矮化与自嘲;同时,他们运用“卷王”“做题家”等带有戏谑甚至轻微贬义的标签去指称传统的“优等生”。这种话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单一的、绩效主义校园评价体系的一种“隐性抵抗”。

**四、引导中小学生学习健康表达的教育干预策略**  
高密度的网络话语环境已经不可逆地嵌入中小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与母语习得周期,因此,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必须顺应数字时代的语言演变规律,基于真实的语用环境,实施科学、靶向的教育干预:

(一)依托语料库语言学建立“动态偏误库”,重构语言规范认知

网络流行语的演变具有极强的即时性、爆发性与不可预测性。对网络新闻语词的规范不应滞后于其实践,正如学者陈静所主张,对其新成定和新用法“要做到动态追踪,顺其自然和适当引导”。

1.数据驱动的词源分析

基础教育教研部门应积极引入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论。通过抽样采集学生日常书面作业、作文样本及校园 BBS 文本,建立校本级的“中小学生学习动态偏误语料库”。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词频与共现网络分析,精准锁定导致该年龄段学生语法失范的核心诱因,如特定类词缀的过度泛化或紧缩句的滥用。

2.对比分析与元语言意识唤醒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提取语料库中的高频偏误表达,开展规范现代汉语与网络变体语词的对比分析。引导

学生从构词理据和逻辑推演层面,解构网络语词的生成机制,使其在元语言认知层面深刻反思网络话语的局限性,从而唤醒并内化母语规范意识。

(二)引入语体学视角,建构“场景化”的语码转换能力

语言的得体性是现代社会交际能力的核心。治理校园话语“梗阻”,关键在于帮助学生厘清网络语体与正式语体的边界,消除语体混杂带来的书面语污染。

1.确立语体边界与功能区隔

校园网络流行语本质上属于带有口语化、娱乐化及圈层化色彩的社会方言。教师需明确界定网络口语与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功能分野:前者适用于非正式的同辈社交,旨在供给情绪价值与圈层认同;后者则承载着逻辑论证、学术表达与严肃社交的核心功能。

2.靶向训练“语码转换”

依托情境认知理论,学校应创设多元的跨媒介交际场景。在包容学生于非正式语体中展现语言创造力的同时,设定严格的书面语用红线。通过设计诸如“将网络段子改写为客观、严谨的新闻报道”等语用转化任务,实质性提升学生在不同语境切换、不同受众之间进行语码自如切换的能力。

(三)强化长程文本输入,对冲“碎片化”语言降级风险

克拉申指出,规范的语言输出并非源于机械的语法操练,而是高质量输入自然内化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将干预重心前移至语体输入端。学校应系统性拓展跨媒介的整本书阅读与经典纯文学研读项目,通过强制性、大剂量的优质现代汉语长篇文本输入,为学生提供包含复杂修辞语与严密关联逻辑的“高”语料。

4.以长程阅读重塑学生大脑的复杂句法建构图式,从而为其健康、规范的网络与现实话语输出奠定坚实的认知底座。

**五、结语**

面对媒介迭代引发的语言生态重塑,基础语文学教育应当向转向语言学规律的科学习疏导。依托动态偏误语料库建设、语体意识唤醒及长程文本输入等靶向干预策略,不仅能够有效消解校园内部的话语“梗阻”,捍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更旨在赋能青少年在复杂的数字话语环境中培育精准的语码转换能力与媒介素养,最终为其构建理性、得体且可持续的健康语言生态。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正当边界构建

■ 刘双双

2021 年《行政处罚法》赋予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权,为地方立法填补上位法法律漏洞,适配地方差异化治理提供了法治支撑。这一权力兼具补充性与创设性,若缺乏清晰的行使边界,极易出现权限泛化、与上位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既损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影响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构建科学合理的正当性边界,是规范补充设定权行使、平衡法制统一与地方治理灵活性的关键,其核心可以从法定性、必要性和程序性三个维度展开,推动地方立法从“有法可依”向“良法善治”转型。

法定性是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基础,核心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权力行使的首要前提。补充设定权并非地方立法机关的固有权力,而是由《行政处罚法》明确赋予的权限,其行使必须严守法律框架,无授权则无行使资格。从权力行使来看,必须以上位法存在立法空白为前提,若上位法已对某一违法行为明确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不得突破上位法规定增设种类、提高幅度,更不得任意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避免与宪法及上位法相抵触。

从适用范围来看,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需严格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四大领域,金融、税收等中央专属管理事项,地方无权涉足,这是《立法法》对地方立法事项的刚性约束,也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关键。从处罚种类来看,地方立法对不能设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只能在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等法定种类内选择适用,从源头上压缩权力滥用的空间。此外,法定性还体现在立法目的遵循上,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不仅要做到条文形式上不抵触,更要与上位法的核心精神、立法目的保持一致,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律规范形成有机衔接。

必要性是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实质性要件,核心恪守“非必须不设定、非最小侵害不选择”、“杜绝”为处罚而处罚”的形式化设定。行政处罚通过减损权益、增加义务的方式实现惩戒目的,必然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负担,这就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在补充设定处罚时,必须先充分论证其必要性,针对特定治理事项,是否无其他非处罚手段可替代;在能实现治理目标的前提下,是否选择了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处罚方式?这既是行政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也是比例原则对地方立法的基本要求。比例原则要求行政处

罚的补充设定应当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成比例,确保罚当其罪。在规范目的上,行政处罚必须契合行政执法目的,确保所采取的处罚措施能够切实地服务于治理需求,避免处罚手段过重或过轻,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在实施路径上,应当优先选用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在能够达成治理目的的多种途径中作出最优解,以此破解地方立法中处罚设置重复、单一、混乱等问题,防范行政处罚超出实际的必要限度。在价值权衡上,还需统筹考量行政处罚对治理效果、行政效能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综合影响,审慎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确保行政权力始终处于合理边界之内。简言之,必要性边界要求地方立法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让行政处罚成为地方治理的“必要手段”,而非“首选手段”。

程序性是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制度保障,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确保权力行使全过程处于监督之中。《行政处罚法》已对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一方面,立法参与程序需做到广纳民意,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必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行政相对人、行业代表、基层执法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让立法充分贴合地方实际,符合群众预期,真正体现民主立法。另一方面,备案审查程序需做到全程监督,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时,必须书面详细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裁量标准等全部事项,接受备案审查机关的实质性审查。审查机关需对立法的合法性、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法规限期修改,通过上级监督审查权力行使的程序防线。此外,书面说明程序作为衔接立法与备案的关键环节,能让备案审查机关清晰地掌握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确保监督不缺位、不滞后。

在法治政府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是地方立法制度的重要创新。地方立法机关唯有严守三维正当性边界,让补充设定权的行使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既填补上位法立法空白,满足地方差异化治理需求,又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公民合法权益,让补充设定权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良法善治手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地方立法支撑。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